

《圣经》的跨文化元典意义

刘洪一

(深圳大学校长办公室,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希伯来《圣经》记载了希伯来(犹太)民族早期所经历的游牧式的文化迁徙及其对周边异质文化的采借、融合和冲突。作为一个跨文化的文化元典,《圣经》的跨文化思想资源表现在它的一神论思想和单种论学说,也表现在它的民族学思维,特别是《圣经》对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意识的交织融合,是《圣经》跨文化思想和思想方式的特质所在。《圣经》的跨文化意义表现在它在元典传承中的超神学价值、普世意义、丰富的思想方法论价值和科际整合视野,以及它所显示的突出的现代性和前沿性上。《圣经》的跨文化元典意义对于反思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冲突和文化难题,不无启示。

关键词:《圣经》;文化元典;思想方式;跨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G 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5)04-0061-06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化与本土化以及文明的冲突问题为学界所关注,并被空前地重视起来,甚至可以说,包括“国学热”在内的研究思潮,也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寻求本土文化的固有位置的语境中发生的。这种跨文化的视野与其说是“学术周期”的学科表征,毋如说是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现实性和必然性要求。其实,历史上异质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以及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调适问题,其尖锐和复杂程度丝毫不亚于现代,并在诸如《圣经》之类的文化元典中集中地表现出来。面对当下斑驳陆离的学说思潮,聚焦于《圣经》元典,不仅能获取审视当代文化与文明冲突的历史视野,还能得到某些有益的思想启迪。

希伯来《圣经》(The Hebrew Bible)^①作为古代希伯来民族历经千年汇集而成的文化典籍,生成于约公元前 10 世纪至公元前 2 世纪之间,凝炼出体系性和启始性的思想元素,并与希腊文化一道,成为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之一。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典籍,

其内涵实质上远远超越了宗教范畴,是一部值得深入开掘的跨文化元典,甚至当代多元化的批评思想和批评文论,也可溯源于此。

《圣经》:一个跨文化的文化元典

从 20 世纪初叶开始,西方有学者开始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圣经》。上世纪的 50 年代,一位一向关注现代科技成果的德国记者维尔纳·克勒尔(Werner Keller)被法国考古学家帕罗特(Parrot)教授和舍费尔(Schaeffer)教授关于幼发拉底河附近出土的楔形文字板的研究报告所吸引,这些出土的楔形文字板上载有与《圣经》有关的内容。此后,维尔纳·克勒尔这位自称为“科学的门外汉”的记者开始专注于美、英、法、德诸国学者在中东、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地的发掘研究成果,搜集了大量的研究资料,竟于 1955 年出版了一部影响广泛的著作《作为历史的圣经》(The Bible as History)。该书在发行后

收稿日期:2005-04-18

作者简介:刘洪一(1960-),男,江苏徐州人,深圳大学教授、副校长,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从事犹太文学与文化、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

的20多年中就在世界范围内被翻译成24种主要文字,印刷数达千万册。20世纪后半期乃至到目前,有关圣经历史的考据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巨大的热潮,以致有国外学者(如日本人山本七平)认为,20世纪最获进展的学科,乃是原子物理学和圣经学。在中国,美国纽约《圣经》考古学会会长加利·格林伯格关于摩西出埃及与犹太人的起源(The African Origins of the Jewish People)以及英国学者拉尔夫·伊利斯(Ralph Ellis)的有关论著(如 *Tempest & Exodus*,《大风暴与出埃及》)等,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不仅在学术界,甚至引起一般公众的关注。

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表明,《圣经》具有很强的史实性和历史价值,虽然最初作为一部神学圣书出现,但《圣经》在虚构了有关上帝以及上帝的超验世界的同时,却又是建基于一定的经验史实之上,即使是虚构和神话,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间接地表征了历史,表征了生成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精神观念和思想方式。

《圣经》记载了希伯来民族早期所经历的游牧式的文化迁徙,以及在这种迁徙中所发生的文化融合、文化冲突和由此而生发的各种思想观念。《圣经》这一史实属性的本身决定了《圣经》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跨文化的视野来对待它所记载的历史世界和观念世界。按《圣经》的记载,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的年代里,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吾珥(Ur)城附近(今属伊拉克地区),生活着一个族长名叫他拉(Terah)的闪族部落,他拉的后代便是希伯来人的先祖。“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得,并他儿妇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迦勒底的吾珥,要往迦南地去。”(《圣经·创世记》11:31)这可被视作为希伯来先祖游牧生活的最初起始。按照上帝的旨意,他拉的儿子亚伯兰(Abram,希伯来文原意为“尊贵之父”)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圣经·创世记》12:1)循着上帝的指示,亚伯兰下迦南、去埃及。在亚伯兰99岁的时候,上帝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圣经·创世记》17:4-5)在这里,借助上帝之口,明确引入了“国”和“多国”的概念,“亚伯拉罕”(Abraham)的含义也就是“多国的父”。有意思的是,“希伯来”(Hebrew)这一民族名称原本并不是希

伯来人的自命名,而是作为异族人的迦南人见到这批外来的“越河者”而送给他们的称谓(Hebrew原意为“越河过来的人”)。

希伯来民族越过两河以后,辗转于迦南、埃及诸地,一直生活在迦南人、埃及人、亚摩利人、非利士人、示剑人、他玛人以及巴比伦人等等诸多族类之间,并与这些族类发生着种种纠葛。《圣经》的全部内容,抛开其神学的演绎,可以说都是在反映希伯来民族与异族的关系——包括经济的、领土的,也包括信仰的、文化的。

在希伯来文化的发生和生成上,希伯来人作为游牧部落,一直迁徙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的异质文化环境中,不断采集和吸纳异质文化要素,这种特定的发生方式和文化生态,决定了希伯来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杂揉了各种文化要素后而生成的整合性文化,这从根本上规定了《圣经》内容的跨文化性。

《圣经》对异质文化要素的采纳体现在多个层面,其中最突出的当数《圣经》的素材资源。例如《创世记》所描述的著名故事洪水和方舟的情节,在苏美尔人流传下来的著名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中已有清晰描写^[1](P41);吉尔伽美什史诗描写洪水从大混沌(Chaos)中涌出,与《创世记》描述上帝创世时的混沌在形式上非常类同;《史诗》中乌塔-纳皮斯蒂的劝世箴言,也自然会使人想起《圣经》中的《智慧书》,尤其是想起带有犬儒主义和悲观厌世色彩的《传道书》^[2](P38-39)其它诸如伊甸的传说、巴别塔的故事等等,亦都不难在中东上古文化中找到类似的资源。《圣经》中的一些著名人物,例如摩西(Moses或写成Moshe)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埃及人的名字;亦有学者认为,不仅是摩西的名字,而且摩西的历史观亦是埃及式的,而非迦南或美索不达米亚式的^[3]。事实上,希伯来人的许多习俗、节期,例如割礼习俗、安息日节期等等,亦都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文化传统有着内在联系。甚至在信仰方面,在《圣经》一再强调上帝唯一神的至上权威的时候,仍有一些以色列人事奉异神巴力(Baal),这使得上帝异常愤怒,不过也由此可以看出异质文化对希伯来文化的深刻影响。

当然,希伯来文化对异质文化的采借,并非一成不变地照搬,《圣经》恰如一个熔化器,将希伯来人采集而来的文化元素加以消解和凝炼,并从中生发出

独具希伯来特质的文化内涵,诸如割礼被认作为以色列人与上帝订约的标记,安息日被赋予上帝创世后安息的神圣意义。《圣经》历经约千年,从口头流传到先知整理,不仅记载了希伯来民族的成长历程,更成为古代中东地区包括两河文化、埃及文化及希伯来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的跨文化资源库。而且,这种集合性的文化资源库,它所蕴涵的观念、思想和意识,不仅对后世的犹太生活产生根本性的文化元典和“母本”意义,也对整个西方文明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圣经》作为西方文明的重要创始性文献,亦被称为“西方世界之书”(the Book of the Western World)。因此,《圣经》的跨文化元典意义,显然并不仅仅是针对希伯来—犹太人的,正如托马斯·卡希尔(Thomas Cahill)所说,要了解人们自身及其具备的特征,要了解大多数“现代人”不加思索和不言自明的行为方式的根源,就必须追溯到《圣经》这部伟大的作品——“西方文明的基石”(the Cornerston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1](P7-8)。

《圣经》的跨文化思想方式

《圣经》跨文化视野的生成,就认识论的层面而言,则取决于《圣经》特有的思想方式,以及与这种思想方式相伴而生的观念意识。

《圣经》中的一神论既是《圣经》的核心思想,也是《圣经》的一种典型的思维方式,它虽以神学的形貌出现,但实质上反映了早期希伯来人对世界的一种跨文化认知,反映了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犹太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神教,《圣经》的一神论观念约产生于公元前13世纪的摩西时代,它强调世界上只存在着唯一神,唯一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按“摩西十诫”的内容,唯一神对其信民首先要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圣经·创世记》20:3-4)也就是说,犹太人必须恪守对唯一神的信仰,且连任何有可能危及唯一神的偶像崇拜亦在禁忌之列。可以说,犹太教一神观念是在同异神现象和多神现象的斗争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在宗教层面上体现了犹太教的“跨文化”特征。按一神论的观点,人类始于同一祖先,这是一种典型的单种论(Monophyletic)学说。《创世记》以神话的方

式,记述了上帝创造亚当、夏娃,又由亚当、夏娃繁衍子孙后代,亚当、夏娃的后代则成了各个部落、各种职业、各种身份的先祖。在这里,上帝仿佛种下了一颗种子,它发芽、生根、茁壮生长,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在这棵伟岸的人类大树上,庞杂的枝蔓就是众多的部族。《圣经》一神论及其单种论学说,可以说从根本上规范了《圣经》对世界和人类的认知方式。

与此相联系,《圣经》的跨文化思想方式还集中体现在它的民族学思维上,这种民族学思维及其强烈的民族意识,虽在思想取向上与一神论的形式有所悖逆,但在其思想深层,恰与一神论观念互补,成为《圣经》跨文化思想和思想方式的重要表征。

透过《圣经》的神学帷幕,在《圣经》的潜层,充斥着的是—种强烈的民族学思维和民族学观念。《圣经》在对各类群体划分时,不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尺,去强调“信道者”和“伪信者”,而是充斥着“以色列人”、“埃及人”、“迦南人”、“摩押人”、“非利士人”等民族学术语,呈现的是一种民族学的运思。

《圣经》的民族学运思嵌入在《圣经》文本各个层面,并以特定的方式表征出来。早在《创世记》中,就曾以神话的方式描述了一个兄弟阋墙的故事,这个故事是非常发人深思的:“有一日,那人(指亚当——笔者注)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中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地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它必恋慕你,你却要制伏它。’该隐就与他的兄弟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圣经·创世记》4:1-8)

故事中的该隐是种地的,亚伯是牧羊的,实质上分别代表了上古的农耕部族和游牧部族,而农耕和游牧则是古代中东地区的两种基本的生活、生产方式,该隐与亚伯的故事以神话的方式表征了农耕部族和游牧部族因生产方式、价值观念不同而产生的尖锐矛盾,只不过这种矛盾在《圣经》里又被加入了与上帝有关的神学要素。

《圣经》的民族学思维和民族意识在《圣经》中的有关教义、民俗的规定上有着突出的表现。犹太教严格规定本族人不可与异族人通婚,以此来保持民族的纯正;甚至在家族内部,严格实行“寡嫂内嫁制”,即设若兄长过世,其妻只能续嫁在先夫的兄弟之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居。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圣经·申命记》25:5-6)严格规定犹太人“不可随从异邦的恶俗”:“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经火,也不可占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圣经·申命记》18:9-11)《圣经》规定的这些民俗禁忌,旨在纯洁以色列民族,不为异族“恶俗”所浸染,显示了在多民族文化接触和文化冲突的语境下,以色列人强烈的民族意识。

《圣经》的民族学思维并非天然形成,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缘由。在《圣经》生成的约千年时间里,希伯来人经历了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迦南和埃及地区这一广袤空间里的文化迁徙。这一地区濒临地中海,地貌、地理特征极其复杂,以迦南为例,在这块计约一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包容了沙漠、山地、平原、丘陵、低地、河谷、海、湖、盐湖甚至热带、温带、寒带等气候条件下的各种地理特征。这种复杂的地理状况对该地区众多部族及部族间不同文化的形成具有深刻的规范作用。《圣经》中经常列举的亚卫人、亚扪人、以东人、摩押人、亚摩利人、希未人、非利士人等,生活在特定的山区、平原和洼地,地貌、地理、气候方面大相径庭的自然环境陶冶、潜化了各部族不同的性情和性格,也决定了他们相去甚远的生产、劳作方式,以及他们不尽相同的观念意识、价值取向,并导致了异常复杂、尖锐的民族关系和文化冲突,这不仅成为《圣经》民族学思维的一大成因,也成为在《圣经》的深层始终呈现出跨文化思想视野的重要根源。

值得指出的是,《圣经》的跨文化思想是在两种矛盾、悖逆的观念指向中建构起来的,其一是由一神教、单神论为根基的世界主义思想,其二则是与这种世界主义相抵牾的民族主义意识,这两种观念意识的交织融合,成为《圣经》跨文化思想和思想方式的

根本特质所在。

《圣经》在上帝一神论的核心理念下,建构了一个同沐上帝光耀,共同存在、相互联系的世界化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所有的种族源于一个上帝,一个天父,一个人类的源头,这一思想因上帝的介入而得以有效的生成。实质上,这种世界化大家庭的建构借助上帝的创世学说得以实现,因而带有很强的超验性质。与此相对,在《圣经》对经验世界的界定中,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固存在对现世生活的认知中,这就是在复杂、尖锐的民族关系中,以民族性的固守为指归的民族主义情结。可以说对世界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情结的调适,是整个《圣经》的核心主题,在认识论的层面上,这也成为其观念运思的关节所在。这个关节点,可用在《圣经》中具有核心意义的“选民观”来解说。以色列人的族领摩西告诫族人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圣经·申命记》7:6-8)在《圣经》中,通过神学的操作,在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以上帝的“拣选”将以色列人从万民中独立出来,成为上帝的“选民”(Chosen People)。在《圣经》神学的精心营造下,一个奇特的关系体被这样呈现出来:世界作为上帝的同创物都将普照到神的光芒,但在万民中以色列因得到上帝的特殊眷顾而首当其冲。在这里,希伯来《圣经》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得到了一种“有机整合”。近代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家和领袖之一摩西·赫思曾说,“直到法国大革命,犹太民族是世界上唯一在其宗教中既有民族主义同时也有世界主义精神的民族。”^[1]但显然,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并非是对等地叠加在一起的,赫思在论及犹太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统一问题时,使用了“犹太人的民族之根”(the National Root of Judasim)和“世界主义之花”(its Universalist Blooms)这一形象比喻,非常恰当地说明了希伯来《圣经》是如何调适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也形象化昭示了《圣经》跨文化思想和思想方式的秘钥所在。

《圣经》的跨文化意义

希伯来《圣经》虽然是犹太教的神学经典,但由于对基督教的启导,以及被基督教直接用来作为其宗教典籍的一部分(即作为基督教《圣经》中的《旧约》部分),因而希伯来《圣经》藉助基督教和基督教文化的传播,它所产生的文化影响和文化效力,都是无比巨大的。《圣经》迄今已被翻译成大约2000种语言和方言,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奇迹,是任何一个关注世界文明演进历史的人都不可回避和忽略的问题。

在跨文化的话语中,希伯来《圣经》显示的元典传承中的超神学意义十分明显。如前所述,《圣经》是在综合了两河文化乃至地中海和埃及文化的某些要素的基础上形成的,经过《圣经》的吸纳、消化、整合,汇聚和呈现的是一系列既具新质意义又具初始性的文化意象和文化元素,这些文化意象和文化元素仿佛种子和基因,对后世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产生启示性影响。《圣经》对各类具有“起源”和“创始”意义的文化意象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和呈现,诸如时间与空间的起源(《创世记》1:1)、物质宇宙的起源(《创世记》1:1-25)、人类的起源(《创世记》1:26-2:24)、乌托邦的起源(《创世记》2:8-17)、罪恶的起源(《创世记》3:1-20)、理智与意识的起源(《创世记》3:7-12)、救赎的起源(《创世记》3:8-24)、家庭生活的起源(《创世记》4:1-2)、争斗凶杀的起源(《创世记》4:3-15)、城市生活的起源(《创世记》4:18-22)、种族分类和国家的起源(《创世记》10:1-32)、语言混乱的起源(《创世记》11:1-9),以及各种观念学说、文化事项(从律法、信仰、道德、伦理到建筑、医学、教育、审美、艺术等等),在《圣经》中都有集中的“起始性”的呈现。更为重要的是,《圣经》作为一种“起始性”的元典在其传承过程中,显示出了明显的超神学意义,《圣经》虽以神学文本出现,但它所承载的各种起始性文化元素,超越了神学的规限——不仅超越了犹太教的规限,也超越了基督教的规限,成为世俗性的文化要素,并对后世的文化成长发生潜在而深刻的作用。

与此相联系,《圣经》的跨文化意义还体现在作为一种文化元典的传承,《圣经》具有突出的普世意义,即《圣经》不仅对犹太民族有效,其文化效力也远

远超越了犹太民族而具有一种普世效用。作为犹太教的宗教典籍,《圣经》显然被涂上了浓厚的犹太教色彩;由于犹太教是一种典型的民族宗教,故学界常有一种习惯的认知,即把希伯来《圣经》的效用往往局限在犹太教和犹太民族的范围。这是极其狭隘的,也不符合历史实情。西方学者明确指出,不应忽视《圣经》对“所有社会”产生的一种“累积效用”(Cumulative Impact),甚至认为如果没有《圣经》伟大思想的影响,就很难见到废除黑奴制度运动、监狱改造运动、反战运动、劳工运动、民族运动、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等等^[1](P248)。《圣经》的普世价值不仅显示其重要的跨文化意义,也是应该深入开掘的跨文化资源。

《圣经》的跨文化意义还体现在《圣经》所蕴涵的丰富的思想方法论价值,以及广泛统纳多种学科的科际整合视野。《圣经》在对世界的认知表现中,呈现了极富价值的思想方法,这些思想方法因回应了古代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复杂的自然与社会压力和挑战,吸纳了两河文明、埃及文明等诸多文化的优质要素,表现出深刻的思想机智。在对现世苦难的抗拒中,以色列先知的最大贡献就是创建了一个以上帝为核心的超验世界,并用各种超验的观念来影响人们的现世行为;在对各种世俗目标的追求中,以色列先知通过神学的操作,将世俗功利目的与观念信仰相结合,对以色列民族产生深刻影响。在对世界的认知中,《圣经》尤其对时间的维度进行了创造性发现,不仅强调现时态,更以对将来时态的设置和第二现实的创造,对现时世界进行判断和指引。《圣经》对超验世界与经验世界的设置与沟通,对现时态与将来时态的创设与联结,以及诸如对世俗与信仰、个人与他人、本族与异族、生与死等等人类生活的基本命题,都进行了富有创造的思考,其思想方法和思想机智对后世认知世界具有特殊的方法论层面的启示意义。而且,在《圣经》的建构中,《圣经》无所不包地容纳了各种学科思想,包括律法学、经济学、哲学、史学、伦理学、文学、建筑学、医学、地理学、民俗学、教育学等等,不仅蕴涵了各种学科思想的要素,而且树立了学科思想的方法视野,并在《圣经》中实现了科际整合。

《圣经》的跨文化意义还体现在《圣经》的现代性、前沿性上。《圣经》以传统的文化元典出现,但其昭示的问题和思想,以及它所具有的启示和反思意

义,不仅具有强烈的现代性,也有明显的前沿性。《圣经》的时代与当今世界不可同日而语,但《圣经》时代所面临的文化冲突、种族冲突,以及民族性的固守与同化、信仰与功利、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者等等文化与哲学层面的命题,在全球化的今天,仍然具有恒定性的意义;《圣经》的有关思考,亦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圣经》记载了“人类生活中的所有混乱和矛盾”^[1](P247),同时也汇聚了古代人民历经千年、综合多种文明成果所生发的思想智慧,被西方学者认为具有“前行性世界观”(the Processive Worldview)的源头意义^[1](P250)。当下现代人正面临全球化时代的各种难题,我们甚至可以发现这些难题不仅可以在《圣经》的时代得到类似的溯源,还可能在《圣经》中得到一种历史性的审视。

注:

- ① 本文所论《圣经》指希伯来《圣经》(The Hebrew Bible),它在基督教语境中被称为《旧约》(The Old Testament)。有关《圣经》译文借用基督教《新旧约全书》中文和合本译文。希伯来人的后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亦有“以色列人”、“犹太人”之称。

参考文献:

- [1] Thomas Cahill. The Gifts of the Jews[M]. Nan A. Talese/Anchor Books, 1998.
- [2] 加利·林伯格. 圣经之谜: 摩西出埃及与犹太人的起源[M]. 祝东力, 秦喜清译.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1. 39.
- [3] Eliezer L. Ehrmann. ed. Readings in Modern Jewish History [M]. Ktav Publishing House, Inc. 1985. 265.

【责任编辑: 董世峰】

The Intercultural Meta-code Significance of the Bible

LIU Hong-yi

(Presidential Office, Shenzhen Univ., Shenzhen 518060, P. R. China)

Abstract: The Hebrew Bible records the nomadic cultural migration that the Hebrew nation underwent at their early stage and the adoption,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s of the heterogeneous cultures of the surrounding countries and areas. As an intercultural meta-code, The Bible's resources of intercultural thinking find expression in its idea of monotheism and single-race theory and also in its ethnological thought. And in particular, the interwinding or mingling of cosmopolitanism and a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s just the particular feature of the Bible's intercultural thinking and its thinking mode. Its intercultural significance is expressed in the sur-theological value, universal meaning, its rich ide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value and its vis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 the course of meta-code inheritance and especially in its modernness and its frontier nature. Its meta-code significance presents a kind of enlightenment to our reflections on the civilization conflicts and cultural problems in this globalized era.

Key words: *the Bible*; cultural meta-code; thinking mode; intercultural significance